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3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3 2007
(第6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6)

农户家庭农地流转行为的变迁和形成根源
——1986—2005年长三角15村调查

史清华, 徐翠萍

(上海交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052)

摘 要: 基于1986—2005年长三角15村固定观察点的农户资料,对长三角农户家庭农地的流转进程以及形成根源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长三角地区,农地流转日益加速,农地集聚正由小规模向中等规模和大规模演进,农地零碎程度随之逐步下降;而由于家庭经营类型、家庭文化类型、家庭经济收入水平等家庭因素的差异和区位因素的影响,长三角农户在农地来源结构、农地流转形式、农地流转租金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差异。

关键词: 长三角;家庭农地流转;转包

中图分类号: F30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7)03-0001-09

一、引言

土地是农业发展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我国农村自改革以来实行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农村经济因此也上了一个新台阶。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特别是面对WTO下农产品的国际竞争,传统分散的一家一户式的小规模经营,显然不适应时代发展需要。重新整合农地,建立与规范农地流转市场,降低农地经营的零碎程度,提高经营者的经营规模已成为新时期中国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1-2]。

在传统农业经济时代,经济发展对农地依赖程度较高,农民对土地的重视程度也较高。这期间农户间农地的流动相对较少,而且一般为被迫行为。随着科学技术在农业上的普及和农民素质的不断提高,乡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与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农户经济非农化的进程[3]。因此,在农村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了大量民间农地流转现象。农地重新整合问题也已成为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热点问题。然而,以往的研究多以理论分析和截面调查数据分析为主[4-5],鲜见对农地流转行为的演变进程进行分析。本文基于农村固定跟踪观察点1986—2005年长达20年的农户资料①,重点考察经济较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农户家庭农地流转的进程以及

收稿日期:2007-06-0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0673065;70173016)

作者简介:史清华(1964—),男,山西襄垣人,上海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农户经济问题.

① 本文样本资料全部来自苏浙沪两省一市农村固定跟踪观察点办公室的调查。共包括15个自然村,其中上海5个,江苏5个,浙江5个。自1986年设立观察点以来,观察系统的观察指标有过两次大的变动,分别是1993年和2003年:在调整前的1986—1991年期间,长三角地区的观察农户样本大体维持在1400余户,其中上海和江苏各400户,浙江600户;调整后的1993—2004年期间,长三角地区的观察农户样本大体缩减到1000户左右,其中上海500户,江苏300户,浙江250户。

形成根源,以期对我国未来农村农地管理政策的制定提供一些理论与实证依据。

二、耕地经营规模及结构变化

(一)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分布及演变

就农户的耕地分布看,整个长三角15村农户家庭拥有耕地总体呈现一种偏小规模分布。在整个营地农户中,经营规模在3亩及以下的农户分布量高达64.23%,而经营规模超过3亩的农户只有35.77%,其中超过15亩的仅为1.83%。从分布的变化趋势看,小规模户(3亩及以下)的比例呈现大幅上升趋势,中等规模户(3~15亩)的比例呈现大幅度下降趋势,大规模户(15亩以上)的比例则呈微幅上升趋势。经营规模在3亩及以下的农户由1986年的39.42%,不断升至2003年的最高点69.32%,之后在新政策作用下,2005年回落到64.23%。经营规模在15亩以上的农户则由1986年的0.47%,上升至2000年的0.77%,到2005年达到观察以来的最高点1.83%。长三角15村农户营地规模的这一"两头升,中间降"的两极化分布变化,一方面预示着农地在农户心中的地位依然很高,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的趋势。

表1 长三角15村农户耕地经营规模与农户分布及演变

年份	名义规模(亩)	不同耕地规模的农户分布(%)								
		无地	1亩以下	1~2亩	2~3亩	3~6亩	6~9亩	9~12亩	12~15亩	15亩以上
1986	4.09	6.19	5.56	14.66	16.75	36.41	13.40	5.31	1.26	0.44
1990	3.52	6.99	5.46	18.06	22.14	33.14	10.56	2.62	0.58	0.44
1995	3.32	6.97	5.37	20.53	22.98	35.22	7.34	1.04	0.09	0.47
2000	2.78	13.96	10.57	21.23	20.28	26.32	5.66	0.85	0.47	0.66
2001	2.49	17.82	11.85	21.71	20.00	22.18	4.64	0.76	0.66	0.38
2002	2.34	21.09	11.39	22.60	19.87	18.83	4.24	1.13	0.66	0.19
2003	2.07	29.77	11.66	20.27	16.75	16.26	3.13	0.49	0.78	0.88
2004	2.20	32.36	9.68	18.73	16.02	15.61	4.47	1.46	0.62	1.04
2005	2.23	35.17	6.47	19.31	15.86	15.21	4.42	1.62	0.76	1.19

从表1可以看出,在20年的观察期中,长三角15村农户家庭的农地呈现向营地农户集聚的趋势,且在进入新世纪后这种趋势在加速。虽然真正经营农地规模相对较大的农户,在全部观察户中所占比例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其经营的规模却在全部农地所占份额中呈现一种快速上升趋势。可见,农地流转现象在本区农户中是非常普遍的。

(二)农地来源结构及增减情况的变化

按照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农村或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农户对承包的土地仅拥有使用权。农户对土地使用权的获得,有以人口为基准的"口粮田",也有以劳动力为基准的"责任田",还有从集体或其它农户中获得的"转包田",等等。从表2可以发现,整个观察期农户家庭农地获取的主体方式基本没有变,依然保持两田制("口粮田"和"责任田"),但农户间农地的流转明显加快。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减地行为明显强于增地行为,且呈增强状,具体表现在减地农户的比例以及减地力度高于增地农户的比例与力度。另外,从图1还可以看出,在有记载的12个年份中,农户家庭农地净增加的年份也仅有2个,分别是1997年和2004年,净增力度分别为2.52%和2.92%,其余10个年份均为净减少,其中净减少力度达到2位数的年份有2个,分别是2000年和2003年,净减少力度分别为11.32%和11.35%。江浙沪各地情况也有所不同,在进入新世纪后,江苏5村农户家庭农地的净减少力度呈持续下降趋势,直到

2004 年转为净增加，而浙江 5 村和上海 5 村的农户，其家庭农地净减少力度在进入新世纪后则呈现一种持续上升趋势，到 2004 年突然转增后，2005 年再次转减。

表 2　长三角 15 村农户家庭耕地来源结构及流转情况

年份	年初耕地(亩)	年初耕地结构(%)			当年增减(%)		其中转包(%)		年末耕地(亩)
		口粮田	责任田	转包田	增加	减少	包入	包出	
1993	3.27	42.24	45.11	0.17	0.05	0.09	74.01	52.31	3.23
1995	3.37	40.06	44.22	0.19	0.06	0.12	87.34	56.66	3.32
2000	3.14	38.91	58.25	0.38	0.11	0.47	72.62	43.23	2.78
2001	2.69	34.85	52.70	0.47	0.12	0.32	50.16	15.90	2.49
2002	2.49	32.47	54.63	0.52	0.07	0.22	77.57	51.16	2.34
2003	2.34	89.61		0.26	0.17	0.44	37.02	65.39	2.07
2004	2.13	92.80		0.30	0.24	0.18	91.20	87.54	2.20
2005	2.31	95.89		0.48	0.12	0.20	78.64	93.65	2.23

注：2003 年调查指标调整后，“口粮田”和“责任田”统称为“承包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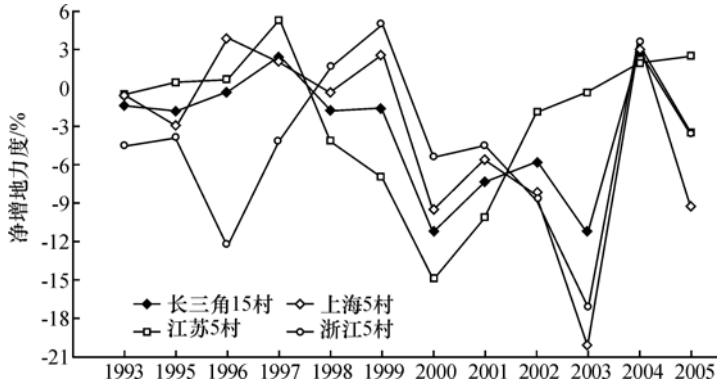


图 1　长三角 15 村农户家庭净增耕地力度及变化

总体上，进入新世纪后，长三角地区农户家庭的农地增减行为力度明显加大，而这一加大的形式又多再现为“转包”，转包形式已成为本区农户家庭农地增减变动的核心方式。

三、农地流转及市场发育

(一) 农地流转趋势

随着农村工业化和乡村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传统意义上的与土地联在一起的“农民”正在减少，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也在淡化[6]。

从图 2 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长三角 15 村农户自发地调整承包地的比例呈“∩”上升趋势。在 1993 年，家庭中有农地增减行为的农户占样本户的比例为 9.34%，到 1995 年升为 9.89%；“九五”期间，农地调整行为在本区呈现大幅上升趋势，由 1996 年的 17.14%，持续快速升至 2000 年的 27.74%；而“十五”期间，这种大幅调整农地的行为出现了逆转，有调地行为的农户比例由 2001 年的 23.13% 降至 2002 年的 16.29%，2003 年又重回升到 22.82%；在新世纪“一号文件”出台后，农地调整再次下降，2004 年降至 14.57%，2005 年进一步降至 13.27%。

将农地流转行为进一步细分为流入与流出，从表 3 可以发现，流出行为的变化幅度要明显高于流入行为。家庭中有农地流出的农户比例由 1993 年的 6.78% 持续上升到 2000 年的 19.43%。2000 年后，即二轮承包后这一行为有所减弱，特别是在 2004 年农业新政策出台后，减弱更加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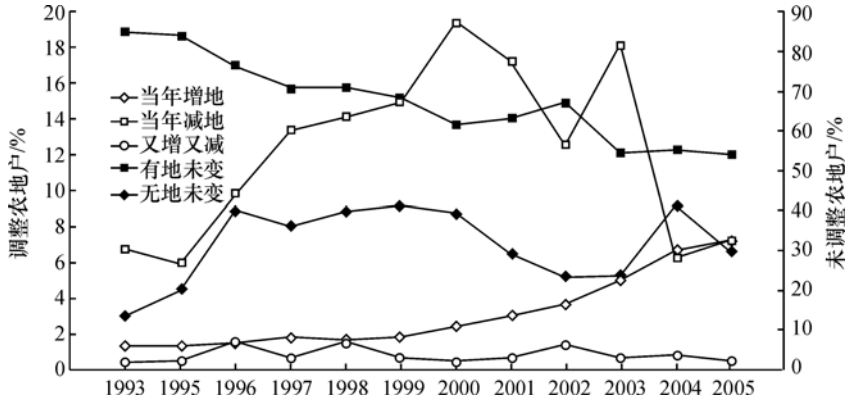


图2 长三角15村农户家庭农地流转行为变化

由2001年的17.25%降至2005年的7.23%。与流出行为相比,流入行为则相对较弱。农地流入的比例在1993年为2.98%,到1999年达到观察以来的最高,为9.17%,之后出现一个持续4年的下降或徘徊,由2000年的8.77%降至2003年的5.29%,农业新政策出台后的2004年出现了一个突增,达9.16%,到2005年再次降回到6.58%。显然,长三角15村的农地流转行为是以流出为主,通过多数户的流出与少数户的流入达到农地的重新整合。

表3 长三角15村农户家庭农地流转行为变化 **单位:%**

年份	年内增地				年内减地			年内既增地又减地
	年初有地		年初无地		年初有地		年初无地	
	未增	增地	未增	增地	未减	减地	未减	
1993	91.07	2.87	5.95	0.10	87.17	6.78	6.06	0.41
1995	89.64	4.33	5.93	0.09	88.04	5.93	6.03	0.47
2000	80.38	8.11	10.85	0.66	69.06	19.43	11.51	0.47
2001	79.81	6.16	13.65	0.38	68.72	17.25	14.03	0.66
2002	78.34	5.08	16.48	0.09	70.90	12.52	16.57	1.41
2003	72.09	5.29	22.62	0.00	59.16	18.22	22.62	0.69
2004	60.67	8.43	30.18	0.73	62.85	6.24	30.91	0.83
2005	60.63	6.36	32.79	0.22	59.76	7.23	33.01	0.54

(二)农地流转过程中的租金

在农地流转过程中转包是最重要的一种形式,占总流转面积的61.2%,其次是转让,占20.5%[7]。在观察初期,长三角地区传统的农地使用权在农户间的转包和转让多为无偿的,有偿只是个别现象,但经过长达15年的第一轮承包实践,农民对土地拥有权的认识不断深化,有偿转包行为也逐渐增多。

从图3可以看出,在一轮承包期间,长三角15村农户,从农地转包行为中能够直接获取收入的比例并不高,常年只有1%~2%,而需要支付"租金"的农户比例却不低,正常年份均在2%~3%,最高的1999年为3.69%。但到二轮承包后,情况明显发生变化,农民从土地转包中获取收入的比例显著增多,由2000年的1.98%快速上升到2005年的10.03%,五年上升近8.05个百分点,最高的2004年达17.48%;需要支付"租金"的比例尽管也呈上升趋势,但幅度却小多了,由2000年的1.32%上升至2005年的3.45%,五年仅上升了2.13个百分点。

从图3中比较农地转包中农户的支付行为还发现,尽管农户家庭有耕地包入,但其无支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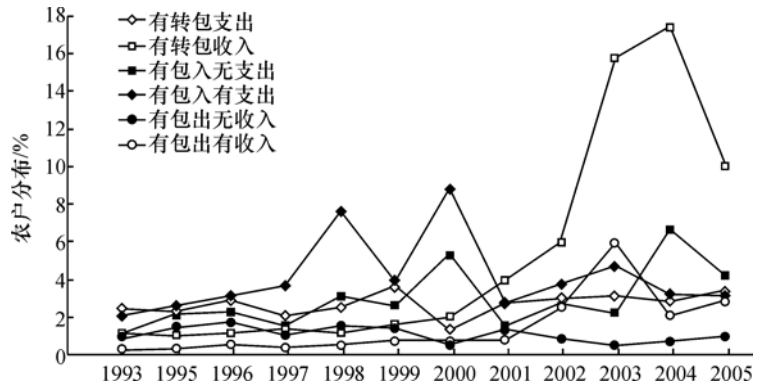


图 3　长三角 15 村农地转包过程中的“租金”支付行为及变化

行为明显强于有支出行为；有耕地包出，无收入行为也强于有收入行为。这一结果充分证明：在长三角 15 村农户家庭的农地转包行为以“无偿”转包为主，真正进入有偿转包是进入新世纪后的事，且这一现象发生以浙江为最[8]。而包入耕地户的转包收入行为与包出耕地户的转包支出行为存在，从某种角度可以说明本区有“反租”行为存在。比较当年无农地转包行为农户，其家庭农地转包收支行为变化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农地转包收入行为，还是支出行为均呈上升趋势，且收入行为要明显强于支出行为。这一结果从某种角度说明：农地市场化意识在本区呈增强趋势，这一增强意味着农地这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农地市场化进程中被激活了。这一变化标志着农地流转市场发育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作为主要农业生产要素的农地，进入了与整个市场经济相融合的进程中。土地财富的观念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概念。

四、影响农户家庭农地流转的因素和根源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农地这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农地市场化进程中被激活，而且呈越来越活跃之势。在农地流动过程中，到底是哪些因素影响着农地在农户间的流转，其根源何在，这是本文要重点探讨的。基于此，下面运用交叉分组的方式对不同类型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

（一）家庭收入水平

从表 4 可以看出，经济收入水平与农户家庭农地流转行为的关系非常密切。随着农户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包入地行为明显减弱，与此相对，包出地行为则显著增强。这表明，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农地的流转方向是由高收入户流向低收入户。

进一步分析可发现，在 20 年演变进程中，不同农户家庭对包入行为需求程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观察初期，即 1986—1990 年期间，农地需求较强的农户是中等收入户，其次是中高和中低收入农户，再次是高收入户，需求程度最小的是低收入户；到 1995 年以后，对农地需求最为强烈的农户逐渐演变为中低收入户，其次是低收入户，再次是中等收入户，第四是中高收入户，需求最弱的是高收入户。这一顺序也可从农户的包出行为比较中得到证明。这表明，在长三角地区，农户经济增长方式是一种“离土”型或“非农化”型增长方式，在家庭经济收入处于较低水平时，农户对农地的需求会敏感些，当经济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放弃或减少农地经营的行为会逐渐增强。

（二）家庭经营类型

从表 5 可以看出，长三角 15 村的农地流转行为与农户的家庭经营类型也密切相关。随着家庭经营非农化程度的提高，包入地行为明显减弱，而包出地行为呈增强趋势。非农化程度相对较高

表4 长三角15村农地转包行为与农家经济状况的交叉分布 单位:%

年份	包入地的户频					包出地的户频				
	低收户	中低户	中等户	中高户	高收户	低收户	中低户	中等户	中高户	高收户
1986	1.26	3.48	4.43	3.48	1.58			未调查		
1990	5.82	6.20	8.73	4.01	5.45	3.64	3.65	4.00	4.01	3.64
1995	2.83	6.57	3.77	1.41	3.30	2.36	4.23	1.42	2.82	3.77
2001	2.84	5.21	3.79	1.90	0.47	2.84	4.27	3.32	4.27	2.84
2002	7.08	4.23	4.72	1.88	0.00	8.96	5.16	4.72	5.16	7.08
2003	3.43	4.88	1.97	1.46	1.47	10.29	12.20	12.81	10.24	7.84
2004	6.77	11.40	9.95	6.22	2.60	6.77	8.29	5.24	3.11	3.13
2005	7.57	8.06	7.03	2.15	1.08	5.41	9.68	9.19	2.69	3.24
1986—1990	3.89	4.91	5.69	4.98	4.61	2.66	3.03	2.88	3.17	3.67
1991—1995	3.27	6.24	4.33	2.82	4.32	4.61	4.01	4.03	3.71	4.91
1996—2000	5.38	6.59	4.81	2.92	1.32	6.42	5.93	6.04	6.40	5.38
2001—2005	5.48	6.65	5.39	2.68	1.10	6.87	7.84	6.99	5.16	4.887

注:“1986—1990”、“1991—1995”、“1996—2000”、“2001—2005”各项分指该时间段平均值。

的农户是农地流转市场的主要供给者,而非农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农户则是主要的需求者。在整个20年的观察期中,不同家庭经营类型的农户在农地流转顺序上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观察初,农地流动顺序是典型的由非农化程度高的农户向非农化程度低的农户转移,纯农户是重要的农地需求户,但到90年代中期以后,纯农户家庭的农地需求程度明显处于第二或第三位,对农地需求最为强烈的农户是兼农户。这一结果从某种角度表明,农户家庭的农地流转过程通常不是直接由非农户一步到位流向纯农户,而兼农户作为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桥梁,起着传递作用。

表5 长三角15村农地转包行为与家庭经营类型的交叉分布 单位:%

年份	包入地的户频					包出地的户频				
	非农户	二兼户	一兼户	纯农户	完全纯农户	非农户	二兼户	一兼户	纯农户	完全纯农户
1986	0.00	0.00	0.00	3.48	3.43			未调查		
1990	0.00	2.60	4.49	7.00	6.93	2.56	3.90	4.49	3.73	4.47
1995	2.78	8.62	8.22	3.12	2.97	8.33	1.72	5.48	2.04	2.26
2000	1.49	14.55	23.44	5.01	5.07	13.43	7.27	10.94	9.64	9.33
2005	0.00	6.98	0.00	9.19	7.98	5.71	2.33	15.79	8.55	8.65
1986—1990	1.09	2.86	3.67	5.44	5.65	3.80	4.76	3.46	3.00	3.33
1991—1995	0.97	4.09	6.94	4.35	3.98	5.83	2.92	7.76	3.75	3.79
1996—2000	1.34	11.46	12.95	3.55	3.29	11.74	9.03	10.24	4.92	4.59
2001—2005	1.36	6.33	11.11	5.68	5.04	9.51	3.62	7.78	6.15	6.39

注:“1986—1990”、“1991—1995”、“1996—2000”、“2001—2005”各项分指该时间段平均值;

纯农户指家庭中生产要素的投入与收入获得80%及以上用于或来自农业,一兼户为50% -80%,二兼户为20% -50%,非农户为20%以下,完全纯农户为100%。

(三)家庭文化类型

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农户的行为除了受家庭经济状况、经营类型等影响外,家庭主要劳动者的文化程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9]。从表6的统计结果来看,自发地包入耕地从事农地经营的农户比率变化总体表现为:农地包入趋向于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农户,当家庭主要劳动者的文化程度低于

或超过一定文化基础时，则趋向包出耕地，从事非农业活动。而这一文化基础就是“九年制”基础教育的完成。从表 6 还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农户家庭文化程度的提高，农地这一相对稳定的生产要素越来越被激活。这表现在：各类文化户家庭农地流转行为在经历 90 年代中期一段低谷后，到 90 年代末有了明显增强，高文化程度家庭对土地的青睐程度与离土程度均呈大幅上升趋势；农地经营出现典型的两极化，即青睐化与离土化。

表 6　农地转包行为与家庭文化类型的交叉分布　　单位：%

年份	包入地户频				包出地户频			
	文盲 -	小学	初中	高中 +	文盲 -	小学	初中	高中 +
1986	2.58	4.03	2.07	0.00	未调查			
1990	6.34	7.22	4.62	5.45	2.93	4.30	3.57	3.64
1995	1.71	4.98	3.42	0.88	2.56	2.84	2.69	4.39
2000	2.20	5.84	7.17	4.24	9.89	9.81	9.70	8.47
2001	1.87	5.32	1.69	0.85	5.61	3.08	3.80	1.71
2002	7.07	3.06	3.49	2.56	7.07	5.29	6.78	5.98
2003	1.65	2.90	2.09	4.85	4.96	12.08	11.75	7.77
2004	3.96	9.55	5.51	9.80	6.93	6.37	3.67	5.88
2005	3.09	6.10	4.74	5.32	4.12	6.10	7.24	3.19
1986—1990	4.95	5.85	3.92	2.58	3.27	3.69	2.39	2.38
1991—1995	3.86	5.66	3.47	1.69	4.59	4.68	3.47	5.07
1996—2000	1.74	5.48	4.03	2.89	4.84	6.37	6.04	5.94
2001—2005	3.43	5.36	3.41	4.50	5.71	6.74	6.53	4.88

注：“1986—1990”、“1991—1995”、“1996—2000”、“2001—2005”各项分指该时间段平均值。

综上所述，在长三角 15 村，农户家庭的农地流转方向大体呈现这样一种状况：高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低收入户；非农户——兼业户——纯农户。农地经营由全面经营向局部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家庭集中。农地流转在人地矛盾紧张的地区较相对宽松的地区频繁，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

（四）农地流转的根源

在以往的研究中，作者曾就农户家庭经济结构转换[10]与农地流转的根源[9]做过探讨，发现农户家庭的任何经济行为都是符合经济理性规则的。这一规则同样适用于长三角农户家庭的农地流转行为。受多种因素影响，农户间对农地需求存在明显差异。农地的流转基本服从农地利用比较效率规律，即农地由利用效率相对低的农户向高的农户转移[9]。

从表 7 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营地农户家庭经济资源利用效率呈现一种恶化趋势。从已有研究看[8,10]，由于长三角农户经济是一种以非农收入为主的经济，农地收入在农户经济中的地位相当低，尽管其农地流转行为发生率呈持续上升趋势，但对改变要素效率恶化趋势并不明显。形成这一结果的根源，主要是由农地的预期福利性决定的。长三角许多家庭经营非农化程度较高的农户，并不注重农业经营，但对土地的留恋以及土地将带来的预期福利使其并没有从根本上放弃农地承包，仅仅是将使用权出让。农户经济非农化的加速发展固然加快了这一地区农地的流转速度，但受该区较高的劳动用工机会成本影响，无疑，包出户获得的效率要略好于包入户。

五、结论与评述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长三角地区的农村非农化进程也在提速，伴随着一个农民离土的

表7 长三角15村营地农户家庭农作物经营资源利用效率

年份	用地效率(元/亩)			用工效率(元/亩)			投资效率(元/亩)			平均雇工价(元)
	经营地户	包入地户	包出地户	经营地户	包入地户	包出地户	经营地户	包入地户	包出地户	
1986	-6.88	-2.38	-	-0.33	-0.12	-	-20.24	-7.36	-	5.18
1990	16.16	13.12	26.22	0.84	0.71	1.41	22.41	18.73	35.80	7.10
1995	89.36	31.42	17.94	5.09	1.69	1.06	53.66	18.74	10.62	18.60
2000	-236.99	-260.33	-170.04	-12.86	-13.82	-11.57	-128.30	-149.09	-94.40	25.98
2001	-200.90	-170.72	-232.24	-10.06	-8.43	-11.19	-109.22	-99.15	-118.36	24.39
2002	-212.79	-192.11	-204.34	-11.95	-10.88	-10.95	-121.40	-112.24	-108.64	25.73
2003	-22.42	7.50	-64.35	-1.70	0.57	-4.23	-11.90	3.95	-31.47	26.11
2004	112.47	126.95	132.21	8.59	9.20	9.25	54.05	59.85	64.02	27.53
2005	-1050.4	-979.71	-981.88	-75.14	-71.70	-78.91	-82.98	-83.88	-80.47	29.95

注:用地(用工、投资)效率=(收入-费用-用工×平均雇工价)/农作物播种面积(用工量、费用额)

过程。农民的离土产生了农地在农户间的流转行为。从对长三角15村农户20年的观察结果来看,农地流转现象在长三角15村是非常普遍的。在农地经营上,长三角15村存在一种典型的两极化状,大部分农户已不经营或经营很少的农地,而少部分农户却经营着大部分农地。

就耕地规模分布变化看,同样呈现一种典型的两极化趋势。它预示着:一方面,农地在农户心中的地位还十分高,不愿轻易放弃;另一方面,土地有一种向种田能手集中的趋势。长三角15村农户正处于一种经营与不经营、经营多与经营少的矛盾抉择中。在长三角地区,农地集聚过程是一个由小规模向中等规模,再由中等规模向大规模户演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农民为了提高农地经营效率,在农地配置上兼顾了效率与公平,让不愿种地的农民将土地有效地集中到种田能手中,同时对希望保留种地权利的农民依然维持着小规模经营的现状。

进入新世纪后,长三角地区农户家庭的农地增减力度明显加大,采用的方式多为"转包"。从影响农地流转行为的因素分析发现:与家庭经济收入水平密切相关,农地由高收入户流向低收入户流转;与家庭经营类型密切相关,农地由非农户向兼业户或纯农户流转,非农户是农地转出的主要源泉,兼农户或纯农户则是农地的主要流入地。农地流转过程通常不是直接由非农户一步到位流向纯农户,兼农户在其中扮演着桥梁与传递作用;与家庭主要劳动者的文化程度相关,农地包入趋向于有一定文化基础,且这一文化程度与当前农业技术相适应的农户,若超过一定基础,则趋向包出耕地,从事非农业活动。高文化程度家庭农地经营呈现一种典型两极化,即"青睐"化与"离土"化。在农地流转市场还不健全,经营农地还需要交纳农业税之时,农地转包多是无偿。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农地转包租金行为明显增强,转包的租金流向与土地流向正好相反。

从长三角农户家庭农地转包与否的经营效率比较发现,尽管农地经营存在着效率恶化问题,但这一恶化只是一种总体评价。具体到转入户与转出户,其转包行为对缓解农地经营效率恶化均是有好处。只是这一好处需要从他们的视角出发来判断。换言之,农户家庭的农地流转行为是符合经济理性规则的。

参考文献:

[1] WAN G H,CHENG E J. Scale of Economies, Land Fragmentation and China's Foodgrain Production[J]. China Rural Survey, 1996,(3):31-36.

[2] WAN G H,CHENG E J. Effects of Land Fragmentation and Returns to Scale in the Chinese Farming Sector[J]. Applied Economics, 2001,(33):183-194.

[3] 史清华，张惠林. 农户家庭经营非农化进程与历程研究[J]. 经济问题，2000，(4)：45－48.
[4] 李明秋，韩桐魁. 河南省农村土地使用制度现状调查及政策建议[J]. 中国土地科学，2001，(5)：42－44.
[5] 叶剑平，等. 中国农村土地农户 30 年使用权调查研究，管理世界，2000，(2)：163－172.
[6] 史清华. 农户经济活动及行为研究[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
[7] 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等. 农村土地流转：新情况、新思考——浙江农村土地流动制度的调查[J]. 中国农村经济，2001，(10)：11－18.
[8] 史清华. 农户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9] 史清华，贾生华. 农户家庭农地要素流动趋势及其根源比较[J]. 管理世界，2002，(1)：71－77，92.
[10] 史清华，黄祖辉. 农户家庭经济结构变迁及其根源研究[J]. 管理世界，2001，(4)：112－119.

Evolvement and Developing Source of Farm Household's Behavior on Farmland Transferring ——An Investigation on 15 Villag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from 1986 to 2005

SHI Qing-hua, XU Cui-ping
(*Aetna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China*)

Abstract: Farmland is the fundamental factor for ag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arm households' operation, and it is reasonable that farmland transferring speeds up with the agriculture's industrializing and the land market's developing.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collected the data from the fixed observational points at 15 villag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YRD) from 1986 to 2005 in order to analyze its farmland transferring process and developing source. It is shown that in the YRD, the farmland transferring progressively speeds up, and farmland gathers from a small scale to an intermediate/large scale. Meanwhile, the farm households in YRD have their specific differences in some farmland aspects, such as the sources, the transferring way, and transferring rental, due to the differences at the location and family factors including the operational types, cultures and income.

Key Words: Yangtze River Delta (YRD); farmland transferring; subcontract